

媒介机器崛起：机器谱系与技术网络

沙 璨, 胡翼青

(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随着机械印刷术的推广,媒介机器悄然登上历史舞台。电子媒介的显形与推广则进一步让媒介机器本身具备了创造媒介化场域的能力,从而型构了现代性的社会世界。这一切引发了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的高度重视,他们从机器研究的谱系中汲取营养,从而开创了媒介机器研究的谱系。然而,随着计算机、阿帕网等一系列媒介机器的涌现,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开放域多轮对话能力之后,媒介机器不仅赋魂“硬”基础设施,而且也通过作为人的语言、知识和计算能力的“软”基础设施使社会实现了万物互联,这无疑预示着媒介机器的彻底崛起,也启发了当代媒介机器研究的想象力。

关键词:机器;媒介机器;媒介基础设施;生成式人工智能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24)04-0001-08

随着传播思想史研究对“媒介入射角”的日渐重视,重新审视技术史的发展轨迹与技术哲学的思辨路径已然成为了媒介研究的关键。而媒介机器(也可以用现代媒介术语将其称为“媒介装置”)及其社会史和观念史,自然是分析媒介研究的重要物质性抓手。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媒介与机器的系统性关联可以追溯到 15 世纪谷登堡发明的印刷机器,这一媒介机器体系对全球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令人遗憾的是,在 20 世纪上半叶法兰克福学派系统地讨论文化工业,特别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对电影技术与媒介机器进行分析之前,在几百年的时间跨度当中,除了培根(Francis Bacon)等少数学者对印刷术等媒介技术予以关注外,生产信息、表达信息的媒介机器仅留存在思想家的只言片语中,比如马克思通过对于印刷工人恶劣工作环境与受教育程度低下的描述来反映机器对人的异化。而近年来,与机器有关的媒介研究以及传播学概念均受到学界的重视,不论是从身体传播走向赛博格传播学的研究进路,还是基于媒介考古学范式对于技术物的另类叙述,“机器”这一存在实体,作为体现媒介物质性的经验材料与关键组成,均未在技术史、概念史层面以整体、独立的视角被阐释,媒介机器及其观念的历史,至今仍然是媒介研究的空白之处。

20 世纪 30 年代,芒福德(Lewis Mumford)以《技术与文明》阐释了机器体系如何形塑“机器时代”,他不仅探讨技术与机器的演进逻辑,还同样重视技术知识的传播过程。但遗憾的是,机器在传播中扮演的角色并没有被其深入讨论,仅以技术表征的形式被描述,而具备媒介性的机器同传播过程发生的关联亦未被纳入其理论范畴。换言之,在芒福德笔下,传播被描述为机器体系的建构条件而非体系本身的组成部分,媒介与机器的关联在文本中发生了断裂。因此,以机器体系的思想脉络为出发点,结合媒介技术的新发展,本文将在思想史与观念史的铺陈之中,探讨并界定媒介机器概念中的一组关键问题——“媒介的机器性”与“机器的媒介性”,梳理机器概念在媒介学视域下的诠释及其对媒介研究产生影响的多重因素,寻找概念断裂之中的连接点,从而对这一研究的空白之处进行粗浅回应。

收稿日期:2024-06-10

作者简介:沙 璨(2001—),男,回族,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胡翼青(1975—),男,江苏无锡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本文通讯作者。

一、元叙事:机器的观念史

讨论媒介机器,要从机器的系谱开始。运动物理学之父勒洛(Franz Reuleaux)认为,“机器是转换力、运动、能量到另一特定方式的部分集合体。”^{[1]10}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生产力革新,蒸汽机统率的工厂大机器生产彻底改变了社会面貌,技术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开始对技术与机器的变革力量予以关注。“正是由于创造了工具机,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2]432}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阐释了作为独立的、人力驱动的工具如何经过技术整合转化为机器,又是如何在工业化的浪潮之下由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工厂中的具备整体化和规模性的机器体系的,在这一过程中,正是因为具体产品生产过程的机械化与工具化,以蒸汽机为动能、流水线为主导的大机器生产才得以实现。可以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世界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断裂点,大工业机器作为一种强势的技术中介形塑了人类文明的生活秩序。机器作为工业革命过程中最重要的技术载体,围绕其描述的经验现象可以非常鲜明地反映出社会存在的变动方式,进而展示人与技术的存在状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技术持有一种先验论断,通过传统的“手工技术”(handwork technology)与“现代技术”(modern technology)这一组概念对技术发展在工业革命前后的分野予以区分:整体化、功能化、规模化的现代技术将人类托举于自然世界之上,使人类不得不去依赖机器,被促逼着适应技术塑造的环境。^{[3]932} 马克思与海德格尔虽然都关注到作为关键技术史节点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但依旧将机器的问题递归到异化的主体问题或形而上的技术问题,并没有将机器视为一种本身具有内涵与外延的理论资源。

真正以机器为中心进行理论叙事,将论述视角从“技术”转换到作为物质载体的“机器”的学者是芒福德,其通过对机器进行总体叙事的铺陈,成功建构了一种基于机器塑造文明进程的“元叙事”(meta-narration)^[4],以确立机器在技术史中的核心地位与合理性。“元叙事”(meta-narration)是法国思想家利奥塔尔(Jean-Francois Lyotard)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提及的关键概念,主要用于对现代性知识合理性建构的批判,此概念亦被历史学等学科予以引用以表明叙事的总体性。后现代思想虽通过怀疑元叙事以达成思想的解放,但大多破而不立,依旧依赖于叙事的整体性,因此本文使用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体现出芒福德独特的技术史洞见。为了保证理论叙事的横贯性,芒福德对于机器的元叙事理路必然需要强大的串联能力与跨学科思维。正如林文刚所总结的,“20世纪初期技术的迅速进步带来的环境后果,有助于培养一种生态学的范式或者是生态学的思维方式,人们开始思考生活中许多事物的相互关系。”^{[5]15} 生态学思维可以帮助我们跨域理解概念体系,从而建构一体化的概念范式。芒福德对机器的论述就结合了总体的生态学思维与部分工程学知识,保证了理论谱系的专业性与广泛度,其使用机器的元叙事统领了现代技术的复杂叙事,以机器为中心分析了文明演进的过程,从对古希腊机器发明与使用的追溯^{[6]244},讨论到工业机器和生物技术对于现代文明的塑造,这与伊尼斯(Harold Innis)以古埃及的莎草纸为起点对于媒介史的宏观把握^{[7]28} 可谓遥相呼应、异曲同工,两者均把作为载体的机器与媒介视作论述的中心,本体的迁移反映出思想的流变。

在《技术与文明》中,芒福德借鉴了考古学与地质学术语,将技术史的发展划分为三个互相渗透的时期(始生代、古生代、新生代技术时期),并以不同机器的发明与应用作为关键时间节点:机械钟与印刷机作为“根本性发明”,横贯了始生代技术时期的文明发展,并因此促成了其向工业化机器生产为中心的古生代技术时期渗透的过程,从而将机器体系同基于合理性建立的现代性社会体制与运转模式相结合,比如对战争与机器关系的叙述,不仅建构了“战争机器”的神话,更是创造出了“巨机器”的奇观,身处于“军团化”社会中的个体被机器及其神话规训、束缚并控制。技术史发展的诸多不平衡在芒福德对机器史的论述中得到了超越,综合了对机器这一“座架”(Ge-stell)的总体批判,芒福德的人文主义底色敦促其不断提出一种基于人类本位的改良方案,去打破作为控制社会的化身的机器体系。这种机器理论元叙事的建构,是为了通过寻找一种抵抗单向度工业社会的多元技术以改写文明的前进之路,而基于机器史和文明

史聚合而成的机器元叙事,也向我们展示了对技术物的再思考来重塑思想史发展轨迹的整体过程。通过从技术到机器的论述视角的迁移,经典思想谱系逐渐被陌生化,对技术与机器的关系建构起了全新的本质主义论断。

虽然芒福德屡次提及技术知识的传播帮助了机器体系在社会空间中的延展,但并没有对社会层面普遍的传播现象给予足够的关心——传播与媒介应当是机器体系内的一部分而并非外部发展动因。所以,尽管在芒福德所生活的时代,媒介机器已经相当发达并具有了强大的组织和调节能力,但他似乎不太愿意为论述机器的媒介性浪费笔墨,甚至要将传播技术与他的机器体系截然分开。尽管芒福德被媒介环境学看作是先驱而倍受推崇,可是他可能从来没有打算从机器体系的视角分析媒介。而不幸的是,媒介机器在他去世之前不到 20 年的时间,便成为了人类最为复杂和强大的机器体系。

二、本体显形:媒介机器的理论系谱

自 20 世纪起,大众传媒便已经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关键组成部分,具备强大的动员能力与整合能力。相比于非媒介机器,媒介机器更多地结合了内容表征与物质载体两重技术体系,呈现出其“物质-内容”的双重性。回到技术史的演进过程,从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卢米埃尔兄弟有关电影与放映机的发明,到 20 世纪初经由无线电技术发展而来的广播电台,再到英国人贝尔德(John Baird)于 1925 年首次成功实验电视图像传播技术,电影放映机、收音机、电视机通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网络与社会信息系统紧密捆绑,大众传播进一步萌发的技术土壤已然十分丰腴。

电子媒介体系受到关注起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该学派从社会整体批判的角度对理性主义主导的现代性社会进行的深刻反思固然值得称道,但以本雅明为代表的对机械复制(今天看来就是一种典型的媒介机器运作方式)等技术微观层面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本雅明明确地意识到媒介机器的海量复制能力深刻扰动了现代生活。基于媒介中介的时空抽离让我们更多地直接面对机器:摄影机和放映机作为媒介机器使电影演员感觉自身被流放、被拆解^[8],而电影观众则是面对放映屏幕想入非非。从这点来说,机器与媒介的组合力量是具有建构性和控制力的,人类逐渐被媒介机器包围,人与人的交流被人与机器的交流所取代。

在另一方面,将芒福德看作是本学派先驱的媒介环境学,并没有因为芒福德对媒介机器的无视而停止对其的研究,相反,他们把芒福德的机器理论成功地转向了媒介机器。媒介环境学派通过机器研究的元叙事开展媒介技术的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史的理论叙事亦逐步被细化为媒介史的整合工作。当然,这个过程对于媒介环境学而言显然是渐进的。在麦克卢汉 1962 年出版的《谷登堡星汉璀璨》这部独具一格的媒介史著作中,多次提及印刷术和印刷文件,却鲜见对于印刷机器本身的描述,“印刷术作为一种热媒介让人们第一次有能力看到本国语言,并能够根据本国语言的限定,对国家的统一和权力进行视觉化”^{[9]236},“印刷文件建构了国家的统一性与政治的中央集权,但同时也建立了个人主义和反政府主义”^{[9]358} 遗憾的是,无论是印刷术还是印刷文件均离不开印刷机器体系,但麦克卢汉作为一个人文主义的学者显然没有讨论印刷机器体系的兴致。而波兹曼(Neil Postman)则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细致考察了印刷机器对美国公众认知与思想的影响,旗帜鲜明地指出印刷机器是一种话语结构^[10],直接在物质实在层面影响到了人们的思想与意识。这不仅指涉代表文字符号的结构主义表征系统,更意味着媒介机器本身成为垄断社会意识再生产途径的关键。

当然,麦克卢汉对机器体系的思考必须结合他对媒介文化的整体论述才能显现。整个 20 世纪都是电子媒介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大众传播离不开电子媒介的普及,媒介机器如果直接成为传递信息的渠道,便足以产生更加强势的扭转力量,这股力量发生于电子媒介与大众传播的耦合处,同时这也正是麦克卢汉针对广告业发起媒介批评的主场。在《机器新娘》这部颇具实验意味的批判文集中,提及了汽车广告、《时代》周刊等大量生动的传播案例,广告业利用了机械化的生产方式和集体消费心理,创造出一种控

制和操纵消费者的文化环境。广告通过夸大其词、激发潜在欲望和利用人们对社会认同的需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机器的普及和工业化生产导致了人与技术的异化,人们逐渐失去了对自己生产活动的控制和理解,生活得就像技术世界里提线木偶般被操控的“机器人”^{[11]30}。机器体系成为了抽象的“暴君”,通过媒介性所赋予的传播力量,破坏性骤然显形,而人类只得选择放弃抵抗。“在这个加速发展的时期,机器世界开始表现出威胁人的、不友好的面孔。”^{[11]65}这一颇具隐喻色彩的批判直指媒介机器对人类世界的侵略性,即便后来莱文森(Paul Levinson)通过其媒介进化论强调了媒介技术演进过程中的人性化趋势,但这种观点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媒介机器与社会高度互嵌的过程实际代表着人类主体性的不断让步。

媒介批评塑造一系列富含隐喻意义的神话,这种神话的隐喻不仅体现在媒介本身,即波兹曼有关“媒介即隐喻”的论断,也体现在物质技术与社会信息系统广泛接合的隐喻之中,正如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所言,“媒体时代模糊了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12]168}。媒介的机器性本身便是笼罩整个社会的隐喻的铁笼,个体成为机器的螺丝钉,而机器的媒介性则作为人的延伸被最直观地呈现在大众传播时代的受众面前。媒介机器体系的发展代表了两股变迁社会的力量——媒介与个体、媒介与社会整体的关系变迁。个体层面,媒介机器影响着主体对世界的认知,不断限定主体性的发挥空间;社会整体层面,文化工业的媒介内容生产使得机器成为了社会控制网络中的节点,从而聚合成对控制社会的隐喻。

三、谱系结合:物质性转向中的技术下沉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愈演愈烈,先前的人本主义叙事已经无法应对技术的狂飙突进,“媒介是人的延伸”或许应该说成“人是媒介的延伸”^{[13]1}:社会治理技术与数字媒介技术在现代社会正逐步走向统一,随着媒介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持续整合,媒介机器基于二进制的技术逻辑开始主导人类的行动逻辑。媒介的角色已然发生转变,不再仅仅是辅助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功能或工具,而人类亦转变成了媒介机器扩展其时空影响力的延伸终端。究竟是媒介充当了人的“义肢”,还是人被媒介并入到异质性网络当中并成为整个系统的一部分?这永远是一组答案的背反。当然,现象学可以通过“悬置”来解决部分问题,但主体的位置依旧需要我们经由宏观结构的把控以寻找、锚定,基于上世纪中甸这样一组围绕思想史层面的碰撞与融合,技术哲学研究的物质性转向也由此发生。这就诞生了基于物质性转向的媒介研究。西门东(Gilbert Simondon)对技术物的研究具备物质性层面的典型性,详细分析了机器的演进过程,从简单工具到复杂技术,从简易真空管到复杂三极管的电力机器设计,反映出每一种作为技术存在形式的机器在与人类实践结合时均存在一种独特的演化规律。西门东认为,通过一种使用者无法完全掌握的不确定范围,机器不再是琐碎的零件,而是逻辑性组合的整体^[14],这恰好与物导向的本体论中物的不可还原性相对应。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这种整体思维在技术哲学的论述中愈发多元与强烈。

而兴起于20世纪中甸的计算机技术则彻底改变了机器体系的机械性特征。以电子管技术与冯·诺依曼体系结构为基础,美国于1946年制造出通用电子计算机ENIAC,指数式地提升了计算效率,而控制论的提出则使得计算机器的控制系统与自然生命的运动模式发生联系,在维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视域之下,机器可以被形容为一套具备反馈机制的系统。正如维纳对控制论的定义所言,控制论是“动物与机器中控制与通信的科学”,这种涉及到机器内部循环机制的理论弥补了理论叙事的空洞,他在《人有人的用处》中强调,“计算机是自动化工厂的中心”^{[15]140},维纳用感觉器官与效应器官区分了机器之间的差异,模糊了动物、机器、人类控制机制之间的界限,而计算机等高级机器作为深受控制论影响的技术载体,支配着数字化逻辑取代自然语言逻辑的运转原则。西门东认为,高级机器通过内部的反馈机制和信息处理,能够自我调整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一点在自动控制系统中尤为明显。基于此,具备广泛联结基础的通信机器体系从最初的阿帕网(ARPANET)出发,逐渐迭代、推广为一张连通全球的因特网,个体化的、接受模拟信号的媒介经由数字化进程连通世界,而媒介机器与非媒介机器的边界也经由数字化

进程而交融。

在数字化技术走向普及的 20 世纪 80 年代,机器层面的数字化符号体系与编程语言已然替代了自然语言成为信息流通的主要载体,光电信息通过数据传递过程中快速的编码解码实现秩序井然地传递,信息内容的完整性也可以得到保证,“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象征界曾被尊崇为作家或天才的最佳创意;现在则是一片由计算机器统治的天地。”^{[12]199}。基特勒认为,媒体技术的分工促进了媒介形式之间的交融,在光学、声学与视觉文字被机械化存储、合并之后,它们又通过各自的数据流还原为整体层面的多重感知,这也是麦克卢汉的“媒介杂交”想要表达的:基于二进制技术的数据流汇集形成了一个由不同分身构成的“魔像”。换言之,主体对媒介与机器的不同感知,被数据流通的传输法则所合并,这种合并又进一步促进了媒介对人境况的决定性意味。基特勒通过对哲学史的梳理,展现了哲学家在形而上学论述的过程中如何系统性地忽视了媒介这一位阶,这与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对西方传播思想史中反媒介传统的论述是一致的。直到存在主义技术哲学兴起,媒介技术才得到重视,“人类、生物和机器将不再被我们置于形式和质料的二分法中”^[16],而是成为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活跃于“硅固态物理和冯·诺依曼体系”的双重条件之下^[16]。由此,当信息革命中控制论概念与计算机架构被赋予机器,媒介机器便在技术史拐点上完成了思想谱系的合并与论述对象的统一,媒介的机器性也被直观体现在计算机器的二进制编码体系与运算逻辑当中。机器的媒介性则体现在媒介终端一个个界面的呈现之中。

在二进制编码的世界中,媒介机器的逻辑与所有机器高度耦合,以愈发全面的媒介形式向我们展现这个多彩的世界,并逐渐完成数字化世界的下沉,人们对数字媒介的使用趋近于日常化。被机器世界包围的主体深刻体会到无法越过媒介机器与世界交流的境况,在通过二进制编码排列出的技术图像感知世界的过程中,我们甚至连机器本身的质料,即媒介基础设施的物质性都无法感受,机器传输的碎片化内容,不仅将重新定义“人的用处”,也打开了学界的论述视野,为非媒介机器本身赋予媒介性——数据与图像均通过电子终端界面呈现。对媒介机器的讨论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谱系合并之后作为论述对象的媒介机器向我们展现出两个对立统一的面貌,基于二进制编码显现出统一性与具体应用场景中体现的异质性。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日常生活中的非媒介机器也具备了媒介属性。计算机技术的演进与发展,促使所有非媒介机器都必须同媒介机器深度绑定,更广阔的机器体系被赋予媒介性。主要以“软”基础设施面貌示人的媒介基础设施,彻底实现了对“硬”基础设施体系的“赋魂”。

纵观 20 世纪技术史,在信息技术与媒介技术发展革新的不同阶段,基于可计算性的程序设计逐渐得到了全面运用。信息在数字化过程中被二进制编码统摄并流通,而决定信息流动方向以及被截留或是被传达状态的,正是程序基于可计算性完成的判断。因此,可计算性作为媒介基础设施的本质特征,直接为其他所有机械化基础设施“赋魂”。首先,从媒介基础设施的角度出发,分析通信基础设施或互联网基础设施,可以从物质性层面反映出信息存储与流通的中介性特质。正如基特勒所言,“思想被布尔代数所取代”^{[12]18},即便再深邃的思想与文字都要转化并存储在磁盘当中,任何具备传递、接收信息能力的机器都要与媒介基础设施联结才能发挥作用。其次,媒介基础设施作为媒介机器的集合,通过其连通的所有机械设备和机械化基础设施都会被并入到信息的流通网络当中。不论是工厂、电站、大坝的控制终端,还是铁路、空运的调度系统,信息的即时传递在此类基础设施当中都至关重要。自此,从非媒介机器同媒介机器的绑定,到媒介基础设施同其他机械化基础设施的联结并为之“赋魂”,人类进入了整体媒介基础设施的时代。

四、联结的隐没:作为基础设施的媒介机器网络

当然,作为整体的媒介基础设施并不能像其终端的媒介机器一样被广泛而直接地感知,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把握技术史的整体发展路径,更要体现其对于生活世界的多元影响,媒介的机器性与机器的媒介性正在悄然融合异质性社会的方方面面。首先是可见和不可见的影响,从可见的媒介界面,再到不可见

的算法黑箱、互联网光纤、海底电缆,媒介机器体系在当代社会的工程结构与原理均在日常生活中被隐去,唯有相关机器出现故障,导致社会运转停滞时才会以脱轨式的姿态打破日常生活的平衡^[17];其次是对现实空间的入侵以及虚拟空间本体的扩张,技术图像创造的拟态环境彻底颠覆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社会的媒介化进程不仅直接决定人类获取信息的生活方式,更是通过现实空间的基础设施网络直接决定了虚拟空间的生产;最后是联结与断联的问题,虽然用户主体可以选择是否接受媒介机器的信息内容与获取机制,但原子化的个体若是要与社会保持联系,就必须接入到整个社会信息系统当中。不论是空间生产、可见性还是接入网络的可能性,在深度媒介化的进程当中,媒介对社会认知整合发挥了重要作用。夏瓦(Stig Hjarvard)曾在《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里面提到媒介“复魅”(re-enchanting)的概念^[18],意在表达对现代性祛魅之后人类直面不确定性的反思。生活世界与媒介机器高度互嵌的状态,不仅是社会在深度媒介化过程中的核心特征,更能反映出技术网络中媒介机器被隐设的本质,当下的媒介机器不仅包含了个体用户的媒介使用终端,同样也包含被隐设的宏观技术网络,即以互联网基础设施为主的媒介机器体系。

互联网基础设施作为深度嵌入社会结构与发展进程的技术基底^[19],不仅反映出媒介基础设施对自然主义的回归,而且彰显了媒介在社会组织过程中被隐设的强大力量。整体上看,自然媒介与数字媒介在社会形塑层面的同构性,同彼得斯基于人类学对于元素型媒介的探讨相契合^[20],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纷杂,恰恰使得媒介机器的复杂性被基于朴素唯物主义的隐喻所合理化。这种消解并非意在遮蔽现实技术问题,而意在通过将基础设施概念泛化,描绘媒介基础设施的技术性与网络化。人类在以自然为背景的世界当中,不仅可以通过基础设施网络获得便利,同样也可以锚定自身的存在价值,自然媒介与技术媒介一道建构起连通万物的基础设施。而更进一步由总体化、背景化的媒介环境走向更分散的社会网络中,媒介机器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理论中,机器作为重要的技术载体,不仅代表了科学工作的实际成果,也彰显出对社会组织方式的革新,ANT(行动者网络理论)强调行动者在社会运行与组织过程中通过转译活动达成利益共识从而促进社会行动的过程^[21],而作为基础设施的媒介机器,就是随处可见的非人行动者与转译者。媒介机器运转的连续性在基础设施主义的语境中得到体现,机器的物质性决定了介入社会的行动力量,而机器的媒介性则反映出其传递信息过程中强大的转译能力,对作为非人行动者的技术物的反思与重塑之中,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了机器的媒介性。

因此,作为非人行动者互相联结的媒介机器,在整体媒介基础设施的范畴下依旧可以分为偏物质实体的“硬”基础设施与偏技术知识的“软”基础设施,前者在当代社会作为后者赖以运行的物质基础,维系着数字社会的秩序。而互联网基础设施,恰恰是软硬基础设施的结合之处,光纤、基站与终端媒介,代表了作为硬基础设施的机器性,而云端的数据库与信息网络,则代表了作为软基础设施的媒介性,通信基础设施的强大力量亦基于此。

从整体媒介基础设施的普遍性出发,技术史的关键节点推动一代代媒介机器完成媒介空间的延伸,并与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相交融,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交替在基础设施时代完成了内在的闭环。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一种基于数字空间建构而成的媒介基础设施新形式——平台基础设施,再度定义了基础设施的不可见性。如果说生活世界是由可见或不可见的各种规则所控制,那么算法就是数字世界中不可见的规则,在平台基础设施提供的算力与存储空间当中,信息的流动、流量的赋权,都是由算法推荐机制所掌握,社会个体的流动性经由平台与算法完成深度调节,以媒介机器的计算完成对社会资源的配置。由是观之,整体媒介基础设施的不可见性,更多地体现在对媒介机器的技术本身的认知藩篱之中,比如普通个体对算法黑箱的不可见。因此,媒介机器形成的合力,不仅通过庞大的媒介基础设施网络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性主义要求,更藉由此彰显出人类在这一洪流中被广泛联结的生存境况:时间进程的加速性、空间边界的模糊化,都在媒介机器的放大器中不断催化,完成欲望与情绪的再生产,创造出碎片化媒介环境的同时也建构出“去中心化”的平台神话,以种种不可见的规则重塑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与建构。

五、结语:媒介机器的崛起

从印刷机器的发明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电力革命、信息革命、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新技术与新现象,作为技术物的媒介机器在思想史与技术史层面已然证明了其强大的阐释力。伴随着媒介机器与社会世界的整合,新的秩序已悄然诞生,媒介生态学家马修·福勒(Matthew Fuller)认为,每一种机器与主体的组合都会创造出一个身体,“一种形成了其特殊组合性力量及其驱力的力间关系”^{[22]345}。而在当代,这种力量已通过媒介机器加速演化成了一个吸取一切光源的“黑洞”,技术黑箱不仅隐没自身,更意在吞噬社会世界。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和赫普(Andreas Hepp)的《现实的中介化建构》告诉了我们一个简单但具有颠覆性的事实,现象学社会学所言的社会世界已经不仅仅由前数字时代的日常生活所代表,而更多地来自于作为认知位阶的电子媒介及其背后的基础设施。有形的社会世界不再被当作具有唯一性的社会资本来源所分析,平台社会的虚拟空间作为媒介化的重要表征之一,为社会运转书写了新的合法性与制度规则,个体经由数字媒介的成功被作为崭新的社会神话高高捧起,新规则与旧规则分庭抗礼,甚至颇有取而代之的趋势。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各种语言大模型的出现,使得一种开放域的多轮人机对话成为可能,极大地推进了媒介机器的自动化。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让自身从呆板的设定程序和机器语言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高度自动化的类人行动者,而且也让人与媒介机器的关系到达了一种临界点:媒介机器已经不再仅仅是工具,因为它随时可以被赋予主体性,而人也未必一定在机器面前具有主体性。人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双向奔赴,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的制度变革。

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作为媒介机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出的内容已经从声、光、电的数字化符号还原成了人类日常沟通的自然语言。此类媒介机器虽被学者形容为知识渊博、认知平庸的“新常人”^[23],但其在人机交互之中反映出的独立性已然超越了“沟通基础设施”的联结意味: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作为一种通信基础设施完成了信息传递的功能,更是嵌入并渗透到人们的精神世界,从而成为人们语言、知识、计算等思维活动的后台基础设施。这种对媒介本体论在基础设施层面的思考,以“去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塑造着人机关系,帮助我们在人与媒介物对等的前提下去思考问题,以避免陷入人与机器“主奴辩证法”的误区,不将媒介仅作为一种工具去看待,而是以媒介本体论的视角帮助我们延展人与媒介的共生关系。这种视角是由当前媒介环境所决定的,人的行为方式与存在方式已经由固定场所的锚定转化为媒介机器中的变动不居。这种流动性带来的新锚定方式则需要我们回到人与媒介机器的耦合状态当中:既然数字化生存已经成为每一个人的必修课,那么等待着我们的就不仅是对媒介机器的掌握,而是接受与媒介机器共生的现状,积极拥抱作为新技术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从个体层面看,通过对相关信息的补充,在完成自我知识解域的同时,认知突破变得更为可行;而从技术史的宏观进程看来,作为崭新的生产力发展动因,更多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媒介机器即将登上历史舞台,媒介化社会的整体面貌也必将焕然一新。

由是观之,对于媒介机器的概念延展反对将媒介或机器功能化,不论是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转变,还是物质实体与宏观隐喻的契合,均体现在媒介研究的核心——物质形式与表征内容的二分法当中,由此出发,我们可以为更多技术物研究赋予媒介学的面向。芒福德曾通过对泛灵论(animism)的追溯描述人类将有机物与机械分开的做法,并将17世纪哲学家们的工作定义为“将世界的秩序从上帝手里转到机器那里”^{[1]34},以描绘机械唯物主义者眼中机器作为永恒秩序的隐喻。而在媒介机器“赋魂”通用基础设施的当下,其具备的能动性已然超越了20世纪初严格的、辖域化的时空桎梏。无需划分寺庙、工厂、矿区、战场的空间区隔,当前技术环境下任何空间的信息传达与反馈都必须通过媒介机器的联结形成一张完整的技术网络。而回到主体性这一决定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源问题,不难发现,人与机器在认知与信息处理模式上的相似之处被放大了,不论是控制论的递归模式,还是“自创生”(Autopoiesis)理论所描绘的生命系统及其结构,诸多理论均表明,“曾被理解为在诸如人类主体等单一平面上运行的东西开始出现于它处,如技术当中”^{[22]154}。

回到开篇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媒介的机器性”事关媒介研究的价值依凭,媒介机器的运转过程既可以建构成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形而上定律,亦可以结构化为对技术物实体的存在分析,前者体现在机械还原论和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想史传统当中,而后者则体现于研究者通过媒介入射角对媒介技术物的本质还原里,不论是机械宇宙观下的丰富定律,还是基于现象学的媒介机器考古,都加强了思想史与技术史研究的联结。因此,媒介的“机器性”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媒介物表征体系与物质实在,进一步丰富了媒介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机器的媒介性”事关研究对象的拓展,可见性是学者探讨媒介物究竟是作为中介还是作为背景时的一个重要话题,下沉的技术与隐没的基础设施并不意味着研究对象不可见。相反,媒介机器的研究正是要使不可见的事物走向可见,在机器体系中析出具备结构性阐释价值的组成部分,探究其媒介属性,建构出区别于主流技术史的更多叙事可能性,方能丰富媒介研究的经验素材。

拥抱新技术是人类与机器走向共生的前提,而人与媒介机器共同享有主体性所带来的崭新的生存形式与生命体验,也将帮助我们理解人机一元共生的新面向,展现并塑造媒介哲学的更多可能。

参考文献:

- [1] 刘易斯·芒福德. 技术与文明[M]. 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3]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 孙周兴,译. 上海:三联书店,1996.
- [4]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 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 车槿山,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72-75.
- [5] 林文刚. 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 何道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6] MUMFORD L.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M]. New York, NY: Harcourt, 1967.
- [7] 哈罗德·伊尼斯. 传播的偏向[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8] 瓦尔特·本雅明.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M]. 王才勇,译.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 [9] 马歇尔·麦克卢汉. 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M]. 杨晨光,译.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
- [10] 尼尔·波兹曼. 童年的消逝[M]. 章艳,吴燕莲,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0.
- [11] 马歇尔·麦克卢汉. 机器新娘:印刷文明的诞生[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12]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 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M]. 邢春丽,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 [13] 胡翼青. 人是媒介的延伸[J]. 新闻与写作,2022(9):1.
- [14] 吉尔贝·西门东. 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M]. 许煜,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4.
- [15] 诺伯特·维纳. 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M]. 陈步,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16] KITTLER F. Towards an ontology of media[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9(2-3): 23-31.
- [17] 张磊,贾文斌. 互联网基础设施研究:元概念、路径与理论框架[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21(5): 22-32+145.
- [18] 施蒂格·夏瓦. 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M]. 刘君,李鑫,漆俊邑,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93-94.
- [19] STAR S L. The ethnography of infrastructure[J/OL].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99(3): 377-391.
- [20] 约翰·杜海姆·彼得斯. 奇云:媒介即存有[M]. 邓建国,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35-44.
- [21]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106-108.
- [22] 马修·福勒. 媒介生态学: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M]. 麦颠,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 [23] 刘海龙,连晓东. 新常人统治的来临:ChatGPT与传播研究[J]. 新闻记者,2023(6):11-20.

(下转第17页)

(1):1-18.

- [21] WINKLER H. Geometry of time: Media, spatialization, and reversibility[EB/OL]. [2023-12].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9212596_Geometry_of_Time_-_Media_Spatialization_and_Reversibility.
- [22] FRASER J. Turning back time: Friedrich Kittler, reversibility, and media of time axis manipulation[J]. *The new centennial review*, 2021(1):37-69.
- [23] KITTLER F.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36.
- [24] DOANE M A. The emergence of cinematic time: Modernity, contingency, the archive[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22.
- [25] 车致新. “想象界”的物质基础——基特勒论电影媒介的幻觉性[J]. *电影艺术*, 2018(4):94-100.
- [26] 于成. 媒介考古学凝视下的时间性:以基特勒、恩斯特的媒介理论为线索[J]. *新闻界*, 2023(5):34.
- [27] PARIKKA J. Operative media archaeology: Wolfgang Ernst's materialist media diagrammatics[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11(5):52-74.

“Mediating Time” and “Temporalizing Media”: Towards the “Timeless” Human Conditions

REN Yiou, WANG Jiape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ime and media inherently possess a unified dual relation, mutually defining each other: without the visibility of media, time remains an inaccessible abstract concept; without the temporality of time, media ceases to be media. “Mediating time” and “temporalizing media” are two fundamental thread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ime and media.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various forms of time generated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media technologies, while the latt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media regulate and create the human perception of time, and this involves both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media based on time and the technical mechanism by which media construct “temporal forms”. In today's world, these two threads converge, and the existing temporal frameworks are all imprinted with “machines' trace”. The scale of time no longer accommodates human existence, and “timelessness” emerges as a defining human condition.

Key words: media; technologies; temporality; rhythm; binary system

(责任编辑:傅 游)

(上接第 8 页)

The Rise of the Media Machine: Machine Genealogy and Technology Networks

SHA Can, HU Yiq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mechanical printing, media machines have quietly stepped onto the stage of history. The emergence and promotion of digital media have further endowed media machines with the capability to create a mediated field, thereby contouring the modern social landscape. This transformation garner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from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Media Environment School, who,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the genealogy of machine research, established the genealogical framework for media machine research. However, with the advent of a series of media machines such as computers and ARPANETS, and notably, the emergence of generative AI capable of engaging in open-domain, multi-round dialogues, media machines not only give a soul to the hard infrastructure, but also enable the society to realize the interconnection of all things through the soft infrastructure of human language, knowledge and computing power, which undoubtedly indicates the complete rise of media machines and ignites the imagination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ers on media machine.

Key words: machine; media machine; media infrastructur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责任编辑:傅 游)